

# 人文学者的使命与追求

■ 陈恒

“看世界”不能停，我们需要不断睁眼看世界，需要更多的韧劲，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更多的包容，出版更多的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著作，从而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内涵阐发得越来越系统化、学理化、理论化、伦理化、道德化，让世人看到中国文明的辉煌与博大。

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既是历史传承的结果、文明互鉴的结晶，也是对中华文明现状的客观描述；既是我们内在的理想与追求的目标，又是我们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塑造文明新形态的必由之路。不过，我们不能静态地、固化地、僵化地、画地为牢地理解这个基本判断，需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去理解：“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才能正确回答时代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才能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的蓬勃生机和旺盛活力。”

毫无疑问，历史学家对此重大命题的理论阐释肩负重要的责任，担当学术实践与大众传播的双重使命。就当代中国史学界而言，中国史研究者必须放眼世界，世界史研究者必须胸怀中国；中国史必须与世界史相结合，历史学必须与其他学科相结合，中国学术必须与世界学术相结合；历史学家既要有家国情怀，又要有世界精神，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大循环，总结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构建解释世界的新思维、新理论、新方法。惟如此，才能不断丰富、不断完善、不断发展中华文明的五个特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

不可回避的是，我们今天关于家国情怀的某些说法还处于兰克时代的历史思维，当然这也是客观现实的反映，中国还没有完成国家统一。中国是历史上少有的现代复杂国家，这种复杂与磨难也造就了中国的伟大。不过，在我看来，家国情怀与世界主义并不冲突，我们的历史研究更需要有世界精神的家国情怀，既不排斥外来一切优秀文化，也擅于把一切优秀外来文化与当代中国的历史学研究相结合。

## 需要真正的“耐心成本”

就人文研究而言，我们的强项是

研究中国，弱项是研究世界。无论中国多重要，她只是世界众多山头中的一座；无论我们的中国研究多么全面、多面深刻、多么发达，也只是世界的一个面相。讲中国本位时要坚持开放融通——现在的世界，互动更有价值。想象世界的方法很多，改造世界的路径不少。世界的山头很多，而且不少山头并不低，有时还处于绝对控制时空的状态，比如近代五百年就是西方世界的五百年。近代世界的山头主要是由西方塑造的，自启蒙运动以来的各种革命使得西方掌握了“发展”的主动权，竖立了“现代化”这座山头。目前全世界75.04%的学术期刊以英文出版，不是很高的山头吗？这是他们的话语权，是目前世界的中心山头，我们无法回避，更不能做鸵鸟，在当今“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我们必须像运动员参加奥运会一样参与学术奥运，研究其成功的内在逻辑，分析其经验与不足，因为他们扩张与成功的基础是知识与学术。我们需要培养大量精通异域各种山头的各种人才、专家、学者，这是真正的“耐心成本”。现在我们以中国的《世界通史》为例，通过世界史研究几个比较重要的领域看看当今中国世界史学界的基本状况，看看我们投入的究竟够不够。

世界通史的编写不但对于普及世界史知识、提升公众的历史素养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可以让外界了解编写者的世界史观，窥见一个时代的学术水准与精神面貌。英语世界的“剑桥三史”、苏联科学院编写的《世界通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类文明史》等皇皇巨著既代表了不同思想观念下对世界历史的解读，也对历史教育的普及做出了巨大贡献，在学术界具有重要地位。我们最流行的世界通史是周一良、吴于廑主编的四卷本《世界通史》，吴于廑、齐世荣主编的六卷本《世界史》，在国内世界史学界影响巨大，其源头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叙事。但我们还没有能以文明交流、互鉴、互融为指导思想的世界通史。

区域国别研究是服务现代国家的一个多学科交叉研究领域，旨在对特定区域或国家进行综合研究，为政策制定、商业决策、人员往来和文化交流提供重要支持。从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到布罗代尔的《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再到萨义德的《东方主义》……欧美世界已经出版了大量经典著作。伴随中国不断发展、不断融入世界、欲提升对国际关系和全球事务的理解和应对能力，也要求我们不断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今日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各单位一窝蜂上马，热闹非凡，一片繁荣景象，但难免泥沙俱下、鱼目混珠，尤其是很少有人愿意规划长期的基础研究。世界上有很多区域、不少国家，如撒哈拉以南地区、南亚东南亚地区、美国以南的泛南美地区，基本是没有基础研究学者的，可以称之为区域国别研究中的“三南问题”。没有长期的基础研究，怎么会有代表性的学术著作？

在我看来，全球史是区域国别的替代版本，是把整个地球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相互影响的完整区域来对



《加泰罗尼亚地图集》(约1375年)中一页，全部共十二幅(六张双层羊皮纸)。地图集绘制了从直布罗陀海峡到西欧、东欧、西亚、中亚直到中国的交通地图，也包括从西班牙到大西洋、地中海、黑海，再到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航海图。  
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待。这既是学术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又是全球治理思想的无意流露。这个领域已经出现了诸如《西方的兴起：人类共同体的命运》《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等一系列通史类、专题类的经典，影响巨大。反观我国的全球史书写，则是“三多一少”：讨论的多、研究的多、翻译的多，行动的少。唯一的例外是葛兆光先生刚刚主编的三卷本《从中国出发的全球史》，似乎可以作为中国学界从实践层面正式介入全球史书写的标志。

## 人文研究的世界性有待提升

上述三个领域的状况说明我们的人文研究基础还不够强，我们的人文研究反思多于行动，我们的人文研究

世界性还有待进一步提升。从通史编撰到专题研究，我们的各个研究领域在什么时间可以出现全球性的代表著作？人文问题很隐性、很纠缠、很复杂，它不仅是知识生产与制造的问题，还涉及政治理想、民族意识、意识形态等方面，而且一个国家的伦理、道德、正义、权利是否发达发展的利器，是国家软实力的真正体现，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哲学社会科学即传统的“大文科”大致有三种倾向：宣传的、应用的、传统的，其实用的强度依次下降。这种“大文科”包括政经法、教育、艺术、人文四类，大致侧重于经邦济世、人的发展、审美品味、追求真理等方面。从实用价值的角度看，人文属于链条的低端，尤其“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是基础中的基础，处于最低端，但这个低端是一切发展的基座、基石、基础，是看似无用却有大用的学问。

## 图灵奖得主重提「认识你自己」

■ 编译/黎文

今天，中国大陆学术期刊界出于转载与引用的考虑，对人文学术文章的发表要求越来越苛刻，青年学者发表的机会越来越少，个人所发文章的数量远远少于20世纪80年代。另一方面，据统计，全国的世界史从业人员大约只有1200人，这其中还包括大量以教学为主的教师。根据美国历史学家林·亨特的说法，美国大约有12000名历史学从业人员，按照通常比例计算，这其中四分之三的人都是在研究外国史。中国的人口大约是美国的4.24倍，如此看来，我们的世界史研究人数是远远满足不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需求的。我们有多少世界史研究杂志呢？我们的世界史学术出版总量有多少呢？这些总量在整个中国出版业中所占比例又是多少呢？牛津、剑桥、哈佛、耶鲁、哥伦比亚等大学，甚至不少理工科大学都有很好的历史系，且都侧重世界史研究。而我们很多顶尖高校是没有历史系的，更不要说世界史研究、外国研究了。这些现象说明我们的人文学术研究地方性色彩过于浓厚，不善于把地方的变为世界的，把世界的消化为我们的，这与我们的世界大国形象是不匹配的。

文明的活力在于交流与互鉴，积极参与国际学术对话、参与国际学术循环是拓展视野、避免自大，减少国际学术界的失衡、不对等境况的唯一路径。学者的国际参与度是学术活跃的标志，国际学术的参与度是文明开放的符号、文化自信的象征。不过，我们要注意的，在参与国际学术循环过程中，我们自己的知识生产，强调的是知识生产背后的思想观念的独立性、主导性，而不是关起门搞学术。我们应避免把自主的知识生产理解为学术内卷，仅仅关注自己的传统，而应致力于把自己的传统推向世界，变为世界所公认的知识、观念与价值。

人文学术更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就世界史学术研究而言，今天，当我要做什么时，我总想知道牛津在做什么，剑桥在做什么，哈佛在做什么，耶鲁在做什么？明天，当人们想做什么时，总必须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则是我们已经真正掌握了世界知识生产的主动权，拥有了世界史学术话语权的时刻。这时的中国才是真正的知识强国、学术强国。有一天，当全世界青年学人的第一篇文章、第一本著作都想在中国发表，都以在中国出版为荣时，则是中国学术繁荣发达的达成时间。

“看世界”不能停，我们需要不断睁眼看世界，需要更多的韧劲，需要更多的耐心，需要更多的包容，出版更多的具有世界性的学术著作，从而把中华文明“五个突出特性”的内涵阐发得越来越系统化、学理化、理论化、伦理化、道德化，让世人看到中国文明的辉煌与博大。

(作者为上海师范大学世界史系教授)

[本文为作者在2024年6月2日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研讨会上的发言稿]

# “东方的佩姬·古根海姆”

■ 黄蓓

夏洛特·霍斯特曼(Charlotte Horstmann)在20世纪中国现代艺术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被誉为20世纪最杰出的亚洲艺术商之一。这位拥有德国和中国血统的女性，足迹遍及亚洲、欧洲和美洲，编织了一幅跨越东西方的精彩文化画卷，演绎了艺术、商业和慈善交相辉映的动人传奇。夏洛特的成功并非偶然，她拥有敏锐的眼光、过人的商业头脑和坚韧的毅力，更重要的是，她对亚洲文化有着发自内心的热爱和尊重。夏洛特是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中国艺术走向世界市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和参与者，她以独到的眼光和对艺术的深刻理解，为西方收藏家打开了一扇通往东方艺术殿堂的大门。她曾帮助美国著名收藏家约翰·D.洛克菲勒二世和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的馆长劳伦斯·西克曼等人建立中国艺术收藏，为中国艺术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1908年，夏洛特·霍斯特曼出生于德国柏林附近，父亲是一位中国银行家，母亲是德国人。1912年，年仅四岁的夏洛特随父母从德国来到北京，开始了她在中国的神奇旅程。尽管受限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以及父亲的反对，作为女性的夏洛特未能接受高等教育，但这并未阻挡她对艺术的热爱和追求。1924年，夏洛特的父亲因与银行负责人不和，辞职开了福来饭店，这里很快成为接待外国名人的北京文化沙龙。

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就曾住进福来饭店住了一个月，为他的古丝绸之路考察做准备。夏洛特在福来饭店结识了众多艺术品经销商、外国使节和收藏家，其中奥托·布尔夏德博士和古斯塔夫·阿克教授成为了影响夏洛特职业选择的两位重量级人物。

奥托·布尔夏德博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东方艺术最重要的欧洲经纪人，他参与了1935至1936年在伦敦柏林庄园举办的关于中国艺术的展览。布尔夏德当时每年从中国采购两亿，夏洛特曾担任过他其中一次采购过程的翻译，由此对这一行业产生了浓厚兴趣。布尔夏德博士与夏洛特相处融洽，还介绍她认识了其他一些重要的古董商。

古斯塔夫·阿克素有“中国硬木家具研究的世界第一人”“世界上研究中国明式家具的重要学者”之称。他曾长期租住在福来饭店，而他对中国古典家具的看法对夏洛特日后的商业选择产生了深刻影响。

阿克是1928年来到北京的，在清华大学任教，曾指导过季羡林的毕业论文。在这之前，他在厦门大学任教五年，与鲁迅、林语堂相交，鲁迅送过他一本英文版的《阿Q正传》，阿克后来回赠了一本自己写的(Ch. Meryon)。1926

年，鲁迅曾在写给陶元庆的信中说：

“这里有一个德国人，叫Ecke，是研究美学的，一个学生给他看《故乡》和《彷徨》的封面，他说好的。《故乡》是剑的地方很好。《彷徨》只是背脊和坐上的图线，和全部的直线有些不调和。太阳画得极好。”

1930年起，阿克与时任协和医院建筑师的好友杨耀，开始对明式家具展开长达十余年的严谨研究。1944年，阿克以英文出版了《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当时的印数极少，但影响深远。据说，“黄花梨”一词最早是梁思成提出的，他在考察古代建筑、研究明清家具时，发现明代所用“花梨木”与近代所用“新花梨”并不是同一种木材，于是他在“花梨”前加上一个“黄”字，以示区别。阿克即是经梁思成介绍，成为“中国营造学社”最早的成员之一，梁思成还曾翻译过阿克发表的《福清二石塔》等多篇重要的中国建筑学术论文。十多年后，明式家具研究大家王世襄也由梁思成介绍加入“中国营造学社”，比季羨林还小三岁的王世襄通过杨耀转而认识了阿克，很多中文读者也是通过王世襄的书了解到阿克《中国黄花梨家具图考》中的内容。

同样受教于阿克的夏洛特1945/1946年间在北京前门大柵栏开了一家

以黄花梨家具为主的古玩店，当时她婚姻破裂，又有四个孩子要抚养，于是做起了黄花梨家具生意。20世纪70年代，夏洛特将自己收藏的八件明代硬木家具整体出让给了美国堪萨斯城的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成为该馆中国家具收藏的亮点。此为后话。当时，夏洛特在北京开设的这家商店，还兼营服饰、珠宝和绘画，同夏洛特父母经营的福来饭店一样，这家商店也成为北京的一个文化交流要所，吸引了来自各界的人士。获得商业成功的夏洛特还热心慈善，慷慨地支持着中国的孤儿院、医院和学校。

1951年，夏洛特离开北京前往香港，因为没有国籍，她只能在香港停留两个月，之后便定居在泰国。在曼谷，她加入了当地侨民社团，开了一家店，还结识了传奇人物吉姆·汤普森。吉姆·汤普森曾助力泰国丝绸工业实现商业化，是他帮助夏洛特提升了对东南亚艺术的理解。之后，拿到德国护照的夏洛特马上返回香港，她恢复了家具和服饰领域的业务，更在尖沙咀半岛酒店和海港城等高端地段开设起店铺。她的店铺里不仅有中国艺术品，还涵盖了来自印度、泰国、日本等国家的艺术品和古董，旋即成为香港最具特色和魅力的文化场所之一。夏洛特的收藏品

反映了她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理解，以及对亚洲艺术的广泛涉猎，从明清家具到精美瓷器，从丝绸刺绣到玉石珠宝，每一件藏品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她的一部分收藏被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收购，让更多人有机会欣赏到中国和亚洲艺术的精髓。夏洛特的店铺在香港经营了四十多年，2003年她去世后，她的合伙人杰拉尔·戈弗雷继续经营，直到2008年他也去世。

除了经销和收藏，夏洛特还积极支持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她与当代著名水墨画家刘丹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委托他创作了许多作品。现定居北京的刘丹1981至2005年在美国生活工作，他的作品被英国国家博物馆、法国吉美博物馆、美国哈佛大学赛克勒美术馆等多家知名机构收藏。1998年，刘丹为夏洛特创作了一幅《如意》图，作为赠送给夏洛特九十大寿的贺礼，当时他们都居住在纽约。夏洛特的支持和鼓励，为中国当代艺术注入了新的活力。

夏洛特·霍斯特曼的一生与中国紧紧相连，她以自己的方式助力中国艺术的传播和发展。她就像是一座桥梁，连接着中西方的文化，也连接着过去和未来。夏洛特留下的不仅仅是一幅壮观的商业地图，更有一段跨越文化、连接中西的传奇。彼得·沃森在《从马奈到哈顿：现代艺术市场的崛起》一书中认为，她堪称“东方的佩姬·古根海姆”。(作者为上海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师)

“与其他物种不同，我们花费大量时间玩手机、读小说、看电影或寻找可能对我们有帮助的信息。我们就好像是一心吸收信息的机器，一台受过教育的机器。”近日，图灵奖得主、哈佛大学计算机科学和应用数学讲座教授莱斯利·瓦兰特出版新书《可教育的重要性》(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24)，重提“认识你自己”这个古老命题。在系统比较人与其他动物和人工智能之后，他解释了为什么教育应该成为人类的关注核心。

“千百年来，人类探究自我，取得的进步却比想象中要小。但今天，计算机科学带来了一些希望。大型语言模型(LLM)为计算机科学的主张提供了一条线索，在系统比较人造物中，大型语言模型的行为是最像人类行为的。”在接受采访时，瓦兰特说大模型目前取得的成就，甚至几乎没有融入心理学、神经科学及人文学科等诸多稍微复杂知识，而主要基于机器学习算法的泛化能力。

瓦兰特试图建构一个更广泛的认知理论。他认为“智能”这个词已被用得太多，于是在书中提出“可教育性”这一概念。这是人类大脑一种非凡的信息处理能力，一种吸收知识并加以应用的能力。它使我们这个物种与众不同，使我们拥有文明，并赋予我们力量。然而，它也生来就有一些隐秘软肋。虽然我们可以在轻松地吸收自身经验之外世界的整个思想体系，与外界进行信息互动，但我们常常难以正确判断应该相信哪些信息。

从演化遗传的角度来说，人类来自一个对自己的学习过程“保持中立”的世界。当我们的祖先学习如何寻找食物、寻找温暖或庇护所时，这个世界不存在那种从根本上欺骗我们的把戏。这让我们相信感官提供的信息。这样的信任是有效的。但今天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复杂，要核实那些在这个上远离我们的事件描述，存在着根本性的困难。我们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远远超过我们评估信息有效性的能力。因此，我们很容易被那些试图影响我们的人圈套——深度伪造的数字手段，几乎已让人难以抵御；还有某些社会环境中的“煤气灯效应”，可能故意误导甚至破坏人的学习过程。

瓦兰特认为，人和人之间的区别在于我们通过受教育而获得的信念。因此，在穿戴上信仰和知识的外衣之前，我们有必要了解人类的共同点。我们同样要了解获得这层外衣的机制。例如，如何选择要采纳的信念？我们最终了解和相信的所有信念和信息，决定了我们如何谋生以及在日常生活中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瓦兰特呼吁教育领域也应该有自己的基础研究，一如生物学为医学提供基础研究的支撑那样。有了更好的人类认知理论后，人们可以将之融入技术。瓦兰特认为图灵的计算理论就是一个杰出范例。在他之前，“计算”主要是由人类完成的知识过程。而图灵提出通用计算理论，为我们带来了以数字化为基础的当代文明。瓦兰特也是机器学习与计算机科学领域做出奠基性贡献的人物。他自述：“四十年前，当我写下我的学习理论时，在第一段便举了图灵的例子作为激励。现在的挑战是如何迈出下一步，我们将对认知的表述扩展到目前所实践的机器学习之外。如果我们成功了，更好的技术也会随之而来。”

瓦兰特说，人类的“可教育”能力是我们发展文明的主要资产，它使有用的知识得以迅速传播。然而，如果在其中加入了不易察觉的怀疑信息，它就会成为一种负担。我们正处于历史的十字路口。如果我们希望共享这颗蓝色星球，尤其是与我们正在创造的的人工智能系统共享，我们就必须反思我们是谁，是如何走到这里，又将走向何方。